

典型在夙昔——緬懷梅祖麟老師

Everlasting Model: In Memory of Professor Mei Tsu-lin

張麗麗 (Chang Lili) *

2023 年 10 月傳來消息，梅老師走了。他突然倒下，就瀟灑地離開了人世。這真像老師的一貫風格，很乾脆，絕不拖泥帶水，絕不為難學生或讀者。

梅老師擅長結合音韻和語法來解決漢語史上的難題，在漢語音韻史和漢語語法史都卓有成就。他眼界開闊，學問淵博，勇於挑戰歷史語言學上重要議題。單就漢語語法史這個領域而言，梅老師主要關注從中古漢語到近代漢語語法體系的重大轉變，也探討重要語法結構在漢語方言的分布狀況，以及漢藏語共有的虛詞，運用歷史語法、歷史音韻、方言學、歷史比較學等方面的知識處理相關議題，不但展現博通多個學科的能力，也始終秉持嚴謹的治學態度。雖非梅老師的正式學生，但我十分幸運，在進入歷史語法領域的初期便有機會旁聽他的課，並請教博論方向，2015 年也曾與老師通過幾次信。本文僅就極其有限的接觸談談記憶中的梅老師，也藉此機會向梅老師致敬並致謝。

2000 年秋，梅老師於臺大中文系開設「漢語語法史、方言語法史研究」這門課，當時慕名而來旁聽的老師和學生相當多，印象中要比修課學生還多。梅老師瘦高個子，講課時總是站得挺直，表情嚴肅，寫板書也是一絲不苟，有點令人望而生畏。但他的課最讓人受益良多的，也就是來自於這份嚴謹。基本說來，上課內容就是老師的研究主題，或是已經發表的，或是正在研究的。針對每個主題，梅老師都會詳細說明研究中諸多考

量，包含該語言現象可以說明什麼、要怎麼找證據、該從哪些材料下手、論證力是否足夠、還有哪些有待補充之處等等。在課堂上，他也曾說過為文之道。他說，寫文章要能適當總結前人研究成果，讓讀者知道已有哪些重要的論文，同時也要展現戰鬥精神，指出過去研究的不足或錯誤；而在反駁前人說法時，要說清楚自己論點以及和前人的差異，但千萬不要折磨讀者，無涉於論證的相關資料，點到即可，讓讀者自己去找來看。不知這是否跟大學時期受過數學與哲學訓練有關，總之，梅老師很看重論證力，且務求觀點清晰，言簡意賅，而他的課和他的論文顯然都嚴格地貫徹此原則。

梅老師的論證力，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由小見大的高超解題能力。像是推斷漢語動補結構的形成時代，他集中探討「V 殺」和「V 死」這兩個組合的用法變遷，來回答此語法史的大議題。又像是他選取四種上古和早期中古都沒有的句法結構作為唐宋共同語的代表，並據以展開兩方面研究，一方面探查唐宋共同語在各方言的散播情形，另一方面則考察諸方言在共同語影響下的語法演變，而此方法正能凸顯閩方言在眾方言中的特殊性。而為了判定《祖堂集》書中語言所反映的地區，他特別挑選幾個關鍵虛詞檢驗，從而見出該書語言主要屬早期官話，但也滲入一些南方話成分。此外，為了判別四聲別義的時間層次，他則專用去入通轉的例詞，而不用平去通轉或上去通轉的例詞，因為前者才具有時代鑑別力。

* 作者現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文獻在歷史語言學的重要性不在話下，梅老師在課堂上也讓我們看到使用文獻的諸多講究。最基礎的，就是不斷提醒學生要審慎使用材料，留意其所反映的時代和地區，像是東漢佛經雖說有八、九十部，但 Eric Zürcher 已指出其中只有 29 部確定是東漢所作；老師也提醒要留意文獻是否能反映時代變化，像是要在近代漢語眾多文獻中挑選可靠的口語文獻，應參看劉堅和蔣紹愚編著的《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再者，梅老師也常在課上說明如何鑑別文獻性質，像是前文所述根據幾項句法成分判定《祖堂集》的語言，他也以同樣的研究方法判定《朱子語類》語言所屬。他還曾撰文仔細區辨閩語九種語法成分的層次，判定分別來自晚唐、南朝、秦漢，以及非漢語底層這四個層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梅老師十分擅長挖掘文獻的研究價值。課上他曾多次提及成書於 952 年的《祖堂集》及其價值。此書著於泉州，但全書是以北方官話為主，並夾雜若干閩語特徵，梅老師由之見出此書多項價值：一、藉由此書可以瞭解當時北方官話特徵，他說中古方言有兩個，一個是江東方言，一個就是《祖堂集》中所看到的北方官話。二、從此書也可一窺唐宋時期閩語語法特徵，此書作者都是當時閩人，書中也確實夾雜若干閩方言語法成分。三、根據此書的成書地區與語言特性，也可推知以長安、洛陽為標準的早期北方官話已成為全國的共通語。據我所知，正是梅老師首先發現此書的研究價值，並積極推動相關研究，《祖堂集》此後也一直受到學界高度重視。課堂上他也提及多種方言的研究價值，像是可以利用閩語探究官話系統在宋以後的新變化，閩語有的，是宋以前就形成的，閩語沒有的，就是宋以後才形成的；又像是慶元方言非常保守，根本就是江東方言的活標本，自然是研究江東方言的極佳材料。

梅老師的論證，是建立在清晰的語言觀之上，這些觀點常讓學生感到驚艷，進而對語言有一番新體認。他總提醒學生留意各方言資料所反映的時代層次，像是閩方言含有遠古、秦漢、六朝、唐五代這四個層次，而在閩方言到達閩地前，該地區住的並非漢人，廣泛地說就是百越人，所以閩語的底層可能有南亞語、南島語、古台語等的殘留，像是「江」這個詞是從南亞語借入的，

而閩語稱孩子的「kian」這個詞，以及閩語第一人稱區分包括式和排除式，也都可能是來自這個非漢語底層。他也曾詳細論證現代各方言語法結構相近（閩語除外），但在宋朝時期則存在明顯差異，並指出方言趨於一致是北方官話影響所致，繼而引導學生思考共同語的興起和雙方言制的流行在其中所產生的作用，並利用唐五代和宋代口語文獻性質差異來論證這方面的轉變最晚始於晚唐。透過一個個現象的解析，梅老師引導學生更宏觀也更細緻地觀看語言變遷。課上這些指引生動地描繪出各時期各地區的語言樣貌，而且是各不相同，各具特色。

對漢語語法學界，梅老師是位領路人，正因眼光開闊且論證嚴謹，他總是走在學術研究前沿，指出一條條有待開拓的研究路子。在漢學界，從高本漢開始，音韻史和方言學就結合在一起研究，梅老師也呼籲，歷史語法和方言語法也應結合在一起研究，「這是早晚要走的一條路」，而他本人也在這方面做出了漂亮的示範。猶記得第一堂課他就藉由閩語方位介詞 ti（如「坐 ti 椅頂」）本字的探討揭示此一手法，他分別從閩語音韻流變、「著」在南北朝文獻中的用法，以及「著」字功能的歷史演變來加以論證，令人印象深刻。另外，在方言音韻的研究中，學界一直是拿《切韻》音系作為基點來比較，梅老師說「把各地方的音系放在《切韻》音系框架中，歷史演變一目了然」。有鑑於此，他呼籲學界也為語法史尋找一個跟《切韻》音系地位一樣的基準，而他也就此提出其個人見解，那就是唐宋共同語的語法體系。

梅老師雖然嚴肅，但提攜後進之心處處可見。2000 年他在臺大開課時，旁聽的師生很多，梅老師都歡迎，而且還會仔細批改旁聽生的作業，並嚴謹地逐條列出修改意見，我就是受惠者之一。旁聽的那個學期末，也向梅老師請教博論的方向，他想了想，說可以研究介詞。漢語介詞體系經歷很大的轉變，唐以後出現一大批新興介詞，而先秦一些常用介詞則大幅衰微，這個現象值得深入探討。就是在此建議下，我從介詞中挑選了當時最受矚目的「把」和「將」，這兩個處置式標記為漢語帶來新的詞序，這是漢語史上重要演變。當時沒想到，完成博論後，沿著這個主題開展研究，由致使義處置式轉

而關注使役動詞的演變，因其演變涉及多項連詞演變，故又轉以連詞和關聯副詞的歷史演變為主要研究對象，而一路研究至今。可以說，梅老師當時指引我的一條研究路子，就定下了我大半輩子的研究主軸，對我的研究生涯產生重大影響。

對於梅老師的指導，始終銘感於心，但那次期末請益之後，就沒再打攪過老師，即使偶於會議上相遇，也只是很恭敬地向梅老師點頭致意。所以，當 2015 年 6 月收到梅老師的親筆信時，我著實嚇了一大跳。他在信中首先肯定我 2013 年出版的譯書《語法化》，接著談起德國漢學家甲柏連孜 (Georg von der Gabelentz)。《語法化》第二章中詳細介紹甲柏連孜對語法化理論的開創之功。梅老師在信中說，他熟知甲柏連孜寫出當時歐洲最好的一本漢語史通論，也知道甲柏連孜認為漢語和藏語有親屬關係，但直到讀了《語法化》，才知道甲柏連孜在一般語言學也有很高的成就。我想，應該是《語法化》讓他對一位心儀學者有了更多的認識，才忍不住告訴我這些吧，這是由尊重知識油然而生的情感，特別真誠。

梅老師在信中接著提及我在《語言暨語言學》發表的論文〈「即」、「便」、「就」時間副詞功能的形成〉，也對此文表示肯定。漢語史上「即」、「便」、「就」三詞都可作承接連詞，也都可作時間副詞，學界普遍認為其演變方向是由時間副詞發展為承接連詞，這樣才符合語法化由虛到更虛的演變路徑，但拙作提出相反的演變路徑，並論證此發展並不違反語法化的單向性原則。這是跟學界大唱反調，大概展現了老師所謂的「戰鬥精神」吧，所以得到他的關注。因文中引用曹廣順先生關於「就」的文章，梅老師也順勢提及他與曹先生的學術情誼。梅老師 1976 年便開始研究《祖堂集》，1983 年到北大講課時也推薦給學生與同好，曹廣順先生當時也在課上旁聽，他後來的學位論文主題就是「《祖堂集》助詞研究」，並於 1986 年發表論文〈《祖堂集》中的「底(地)」、「卻(了)」、「著」〉，梅老師信中說此文「實在是一鳴驚人」，因而兩人也結為「終身的同志」，再

次見出他由知識而及人的珍重之情。這也讓我想起當年課堂上梅老師一則令人印象深刻的評論。他曾大大讚美瑞典漢學家馬悅然，原因是馬先生很反骨。馬悅然身為高本漢高徒，卻將反對高本漢主張的周祖謨論文翻譯成英文，並發表在高本漢主編的期刊上。對這樣挑戰師門的行為，梅老師認為是「非常了不起」。他對馬悅然的盛讚，也是因為欣賞馬先生尊重知識的態度吧。

梅老師曾在 2010 年發表論文〈康拉迪 (1864-1925) 與漢藏語系的建立〉，文中詳述歐洲比較語言學學者如何一點一滴展開漢藏語系的建構，從 1811 年賴登的論文《論印度支那語言和文字》，到 1881 年甲柏連孜出版《漢文經緯》(Chinesische Grammatik)，再到 1896 年康拉迪發表著名的《漢藏語系中使動名詞式之構詞法及其與聲調別義之關係》一書，漢語和藏語的親屬關係逐步得到確認。在後續通信中，梅老師得知我懂德語，便建議我精讀甲柏連孜和康拉迪這兩本德語著作，並通讀甲柏連孜在語法化理論的相關著作，甚至要我檢驗他在 2010 這篇論文中所做的相關說明。從這個勉勵，深切感受到老師認真踏實追求真相的精神，但因德語多年不用，更何況二書都是 19 世紀的學術著作，我沒有能力也沒有時間完成此任務，只能老實地回覆梅老師。想來梅老師一定非常失望吧，每每思及此便深感愧疚。

梅老師行事乾脆，走得也乾脆。去年 10 月楊秀芳老師轉來梅師母親撰的訃文，得知梅老師是在早上出門穿鞋時倒下的，那時他正要樓下游泳池當義工，兩小時後便離開了人世。梅師母說「當天我到醫院看他最後一面，他的臉容安詳平和，好像說塵世的事已經與他無關了。」我彷彿又一次看到梅老師站得挺直的授課模樣，又一次看到他論證時的專注神情，當他談論學問時，對其他一切也是不管不顧的。「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梅老師雖然離開了，但他對學界的影響還會持續下去，將有更多的學者走上他指引的學術道路，漢語歷史語言學也會在他開闢的沃土上繼續成長茁壯。